

“挤压”与“重塑”：四川乡村学校撤并中的县域教师队伍生态变迁研究

谢红雨

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内江

收稿日期：2026年6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31日

摘要

乡村学校撤并是我国县域基础教育布局调整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对乡村教育核心主体——教师队伍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是乡村教育治理与教育经济学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文章以教育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托，构建“微观个体发展-中观群体结构-宏观治理体系”的三维分析框架，选取四川省平原、丘陵、山区、民族地区四类典型县域开展田野调查，系统剖析乡村学校撤并进程中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双重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乡村学校撤并对县域教师队伍生态形成“挤压”与“重塑”的双向效应，既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引发教师队伍发展的多重失衡困境，也同步推动了教师专业发展升级、队伍结构优化与县域教师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双重变迁背后的内在作用机制，并提出县域教师队伍良性生态的重构路径，以期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关键词

乡村学校撤并，县域教师队伍，教育生态，作用机制

“Squeeze” and “Reshaping”: The Ecological Changes of County-Level Teaching Staff dur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Rural Schools in Sichuan Province

Hongyu Xie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Received: June 8, 2026; accepted: August 21,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The consolidation of rural schools serves as a core policy instrument for adjust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basic educ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Its systematic impact on the teaching workforce—the primary stakeholders in rural education—has become a central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s of rural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s of education. Grounded in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micro-level individual development,” “meso-level group structure,” and “macro-level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across four typical county-level reg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plains, hilly areas,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ual logic of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county-level teaching workforce during the school consolidation proces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onsolidation exerts a bidirectional effect of both “squeezing” and “reshaping” on the teaching workforce ecosystem. While it induces multiple imbalances and dilemmas in teacher development across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it simultaneously drives the upgrading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workforce struc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y-level teacher governance system. Furthermore,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riving these dual transitions and proposes pathways for reconstructing a healthy teaching workforce ecosystem at the county level.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rural teaching teams in western Chin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School Consolidation, County-Level Teaching Workforce, Educational Ecology, Mechanisms of A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¹颁布后，以乡村学校撤并为核心的农村基础教育布局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成为农村税费改革后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办学规模效益的核心政策安排。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1~2020 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从 41.6 万所缩减至 14.2 万所，降幅达 65.9%²；同期四川省作为西部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与多民族聚居省份，乡村小学数量从 2.8 万所缩减至 0.7 万所³，撤并比例超 7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践的典型场域。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我国乡村教育布局调整的政策导向发生根本性转向。2021 年以来，教育部连续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⁴“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¹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0.htm。

²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s://hudong.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108/t20210827_555004.html。

³四川省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tjj.sc.gov.cn/>；教育部数据库分省数据页面(四川分省历年学校数)：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

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适当整合小、散、弱的乡村小规模学校”⁵。政策转向的背后，是学界与实践界对大规模撤并政策效应的持续反思。梳理现有文献，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一是政策效应评估，多数学者聚焦撤并政策对学生就学距离、学业成绩、身心健康的影响，部分研究涉及撤并引发的教师单向流动、职业倦怠加剧等问题[1][2]；二是个体行为研究，重点关注撤并后分流教师的身份认同、职业适应与流动决策等微观层面问题[3]；三是区域实践研究，针对特定地区撤并后的教师安置政策与配套措施进行案例分析[4]。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为本文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核心局限：其一，研究视角上，多从单一维度分析撤并对教师的影响，缺乏系统的教育生态分析框架，难以揭示撤并政策对教师队伍全系统的深层作用机制；其二，研究场域上，多以全国性宏观分析或东部发达地区案例为主，缺乏对四川这类西部多类型县域的差异化实证研究，地域针对性与普适性存在不足；其三，研究范式上，多聚焦撤并政策的负面效应批判，缺乏对政策双重效应的辩证分析，难以回应政策实践的复杂现实。基于此，本文聚焦三大核心问题：乡村学校撤并进程中，县域教师队伍生态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变迁？其“挤压”与“重塑”双重效应的具体表现与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构建良性可持续的县域教师队伍生态？

本文以源于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并经本土化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理论为核心理论基础[5]，将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界定为以县域为基本治理单元，教师个体、教师群体与所处制度、专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共生系统，并依此划分微观个体发展、中观群体结构、宏观治理体系三个嵌套维度，同时结合四川省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分布与乡村学校撤并规模，选取四川省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类区域——成都平原经济区(新都县，以下简称 X 县)、川中丘陵地区(资中县，以下简称 Z 县)、川西高山峡谷区(稻城县，以下简称 D 县)以及大小凉山民族地区(茂县，简称 M 县)作为研究场域。这四类区域在地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基础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差异，能够有效覆盖四川省乡村学校撤并的主要情境，从而增强研究的外部效度。

在数据采集方面，本文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策略。研究团队于 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5 月期间，深入上述四县开展田野调查。访谈对象涵盖县域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12 人)、中心校及村小校长(20 人)、撤并分流教师(68 人)以及未分流教师(30 人)，共计完成半结构化访谈 130 人次，访谈时长累计超过 260 小时。观察对象则选取了 12 所典型撤并学校，重点记录分流教师在新教学环境中的适应过程与互动行为。

针对质性资料的分析，本文引入三级编码技术进行处理。首先，对访谈逐字稿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出“职业倦怠”、“身份认同危机”、“编制周转”等初始概念；其次，通过主轴编码将初始概念聚类为“个体负荷”、“结构失衡”、“制度张力”等副范畴；最后，利用选择性编码提炼出“挤压与重塑”的核心范畴。为确保研究信度，本文实施了数据三角互证：将访谈资料与观察笔记进行横向比对，剔除受访者因情绪化表达产生的偏差信息，同时将编码结果与县域教育统计年鉴数据进行交叉验证，确保研究结论真实反映客观现实。

2. 乡村学校撤并中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双向变迁双重效应

2.1. 撤并政策下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挤压效应失衡困境

乡村学校撤并的核心政策逻辑是通过空间集中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县域“重撤并、轻配套”“重效率、轻公平”的执行偏差，对县域教师队伍生态造成了多维度的系统性挤压。

⁵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726/202309/content_6906513.html。

2.1.1. 微观个体生态的职业负荷过载与发展空间双重挤压

撤并后教师的工作空间与职业场景发生根本性改变，最先受到冲击的是职业负荷的非理性过载。根据对样本县域 300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撤并后分流教师的周平均课时量达到 18.6 节，显著高于原中心校教师的 14.2 节($t = 3.45, p < 0.01$)。这种非对称的工作量分配(Asymmetric Workload Distribution)加剧了分流教师的心理失衡。访谈中，一位来自 D 县的李姓教师提到：“原来在村小只有 12 个学生，周课时 12 节，撤并到镇中心校后，要带两个班的数学，还要兼任科学、体育两门课，周课时 22 节……”。这一观点并非个例，而是具有高度的普遍性。问卷调查显示，高达 76.5%的分流教师认为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非主科教学任务或行政杂务”，而这一比例在原中心校教师中仅为 32.1%。这组数据有力地佐证了撤并政策在执行中存在将“边缘工作”转嫁给分流教师的隐性机制，从而导致其职业负荷的系统性过载。

与负荷过载相伴的，是教师专业发展空间的系统性挤压。其一，职称评定与评优评先的竞争加剧。撤并后教师从分散的村小集中到中心校、县城学校，原本在村小的骨干教师，在新环境中陷入“内卷式”竞争。有受访者表示：“原来在乡里我是学科带头人，职称评审优先考虑，撤并到县城学校后，全校几十名骨干教师，我排到了 10 名开外，5 年内评副高基本没有希望”。其二，专业发展的边缘化困境。中老年分流教师普遍存在信息化教学、跨学科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新学校中难以融入核心教研团队，多被安排承担非主科教学与后勤管理工作，逐渐脱离教学一线，专业能力持续退化。其三，职业身份认同危机。从村小分流的教师，从“乡村教育的坚守者”变为“县城学校的边缘人”，工作环境、社交圈与职业价值感均发生显著变化，职业倦怠与离职倾向显著提升。M 县统计数据显示，2021~2023 年分流的教师中，有 27%的人员申请提前退休或调离教育系统。

2.1.2. 中观群体结构生态的分布失衡与共同体消解双重困境

撤并政策直接重构了县域教师的空间分布，加剧了教师队伍结构的系统性失衡。其一，城乡分布的马太效应凸显。撤并推动优质教师资源加速向县城、中心镇单向流动，乡村学校逐渐沦为教师队伍的“洼地”。M 县 2010~2020 年累计撤并村小 32 所，同期县城学校教师占比从 42%上升至 68%，乡村学校 50 岁以上教师占比从 31%上升至 57%，35 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从 28%下降至 12%，出现严重的年龄断层。其二，学科结构的失衡加剧。撤并后，音体美、科学、信息技术等小学科专职教师几乎全部集中在县城学校，乡村学校仍以语文、数学主科教师兼任为主，学科配备的城乡差距持续扩大。X 县 2024 年统计数据显示，县城学校音体美专职教师配备率达 100%，乡村学校仅为 32%，民族地区 M 县乡村学校配备率更是低至 17%。其三，学历与能力结构的两极分化。县城学校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 90%，乡村学校仍有近 30%的教师为专科及以下学历，优质教师资源的集中化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教师的能力差距。

更隐蔽的冲击，是乡村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系统性消解。撤并前，村小教师虽分散，但形成了以校为单位、兼顾教学与乡村服务的小型专业共同体，教师之间互助协作，共同承担乡村教育的全部职能。撤并后，教师集中到规模更大的中心校，科层化管理模式取代了原有的扁平化协作，教师之间的关系从“互助共生”变为“竞争博弈”，教研活动多流于形式，难以形成真正的专业共同体。同时，随着村小、教学点的撤并，教师与乡村社区的联结被切断，原本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的教师，逐渐变为“走教式”的城镇职业人，乡村教师的乡土性与公共性持续弱化，乡村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逐渐消解。

2.1.3. 宏观治理生态的制度失灵与结构矛盾双重张力

乡村学校撤并本质上是县域教育治理权力的重构，政策执行过程中暴露的制度短板，对县域教师治理生态造成了深层冲击。其一，教师编制管理的结构性矛盾凸显。我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按师生比核定，撤并后学生向县城集中，导致县城学校学生数激增、编制严重不足，而乡村学校学生数锐减、编制大量富余，但编制管理以校为单位，无法实现县域内跨校、跨乡镇动态调整，形成“县城缺编、乡村超编”的

制度性怪象。Z 县 2023 年统计数据显示,县城学校编制缺口达 124 个,不得不大量聘用临聘教师,而乡村学校编制富余 87 个,大量教师处于“有编无岗”的闲置状态,编制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

其二,教师流动制度的逆向失灵。“县管校聘”改革的初衷是推动县域内教师合理流动、促进教育均衡,但在撤并政策的叠加影响下,教师流动变为从乡村到县城的单向流动,形成“乡村学校培养骨干教师、县城学校吸纳骨干教师”的逆向循环。4 个样本县域统计数据显示,2018~2023 年,县域内教师流动总数中,从乡村流向县城的占比达 82%,从县城流向乡村的仅占 18%,且多为临近退休教师或新入职无编制教师,教师流动制度完全偏离了促进均衡的政策目标。

其三,教师激励保障制度的弱化。撤并后,原本针对村小、教学点教师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乡镇工作补贴等政策,在分流教师身上出现政策断层。多数县域的乡村补助仅覆盖村小、教学点教师,分流到镇中心校的教师不再享受补助,但其通勤成本、生活成本却大幅上升。有受访者提到:“原来在村小每月有 500 元乡村补助,现在到了镇中心校,补助没了,每天通勤往返 30 公里,油费每月就要 400 多,相当于收入降了近 1000 元,工作还更累了”。激励保障政策与撤并政策的不配套,进一步削弱了乡村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2.2. 撤并政策下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重塑效应优化转型

在系统分析挤压效应的同时,需辩证认识到,乡村学校撤并作为县域教育资源整合的核心政策,也为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推动了教师生态系统的正向重塑。

2.2.1. 微观个体生态的专业发展平台升级与职业能力全面提升

撤并带来的教育资源集中,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其一,教研资源的可及性大幅提升。撤并前,分散的村小教师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一个学科仅 1 名教师,无法开展集体备课、听课评课等教研活动,每年仅能参加 1~2 次县级培训。撤并后,教师集中到中心校,形成了完整的学科教研组,每周开展校本教研,每月参加县域教研活动,优质教研资源的可及性实现质的飞跃。有受访者表示:“原来在村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集体备课,撤并到中心校后,有老教师带教,有完整的教研体系,3 年时间我就评上了区级骨干教师,这在原来的村小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二,教师专业能力的全面拓展。撤并后,中心校的标准化办学体系,推动教师从单一的学科教学者,向兼具教学能力、班级管理能力和信息化教学能力、家校共育能力的复合型教育者转型。尤其是中老年分流教师,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主动学习信息化教学技术、新课程标准与跨学科教学设计,突破了原有的职业舒适区,专业能力实现系统性升级。同时,集中办学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赛课、培训、交流机会,2019~2024 年 4 个样本县域评选的县级骨干教师中,有 42%是经历过撤并分流的教师,印证了撤并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正向推动作用。

2.2.2. 中观群体结构生态的队伍素质整体优化与专业生态升级

撤并政策推动了县域教师队伍的结构性优化,整体素质实现跨越式提升。其一,教师队伍学历结构的大幅改善。撤并后,县域层面可统筹教师招聘与培养,统一提高教师准入门槛,推动教师队伍学历水平持续提升。四川省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01 年全省乡村小学教师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为 21%,2024 年撤并整合后,这一比例达到 98.7%,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 72%,教师队伍整体学历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其二,学科结构的系统性优化。撤并前,分散的村小无法配备专职的音体美、科学等小学科教师,只能由主科教师兼任,素质教育难以落地。撤并后,中心校可集中配备专职小学科教师,实现学科教学的专职化、规范化。X 县 2010~2024 年,通过撤并整合,乡村学校音体美专职教师占比从 8%提升至 32%,

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专职教师配备率从 0 提升至 27%，基本实现中心校小学科专职教师全覆盖，彻底改变了过去乡村学校“重主科、轻副科”的畸形学科结构。

其三，县域层面教师专业共同体的培育。撤并推动了县域教研体系的重构，多数县域以中心校为核心，构建了“中心校-教学点”一体化教研共同体，推行集体备课、资源共享、线上教研、结对带教等模式，打破了过去校际之间的教研壁垒，形成了县域内城乡教师互助共生的专业生态。M 县构建的“城乡教研共同体”模式，将全区所有乡村学校与县城学校结对，实现教研资源、培训资源、师资资源的全域共享，乡村教师的教研参与度从 23% 提升至 92%，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2.2.3. 宏观治理生态的县域教师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

乡村学校撤并中暴露的制度性矛盾，倒逼县域政府深化教师治理体系改革，推动了县域教师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其一，“县管校聘”改革的全面深化。针对撤并后出现的编制结构性矛盾，四川省多个县域推行“编制周转池”“岗编适度分离”等制度创新，将编制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级教育部门，实现县域内教师编制的动态调整、统筹使用，打破了过去“一核定终身”的编制管理模式。M 县 2022 年出台的编制周转池制度，将乡村学校富余的 112 个编制纳入周转池，统筹调配给编制紧缺的县城学校，同时建立编制“随学生流动”的动态调整机制，有效破解了“县城缺编、乡村超编”的制度性难题。

其二，县域教师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建设。针对撤并后分流教师的保障断层问题，四川省 2023 年出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扩面政策，将乡镇中心校教师全部纳入补助范围，同时要求各地为分流教师提供通勤补贴、周转宿舍、子女入学等配套保障，推动了县域内城乡教师保障政策的一体化。4 个样本县域均出台了相应配套政策，其中 X 县为分流教师提供每月 200~500 元不等的通勤补贴，Z 县为乡村教师提供 1200 套周转宿舍，有效解决了分流教师的后顾之忧，完善了县域教师保障体系。

其三，县域教师治理权责的系统性重构。撤并政策推动了县域教育治理从“以校为主”向“县域统筹”的转型，县级教育部门掌握了教师编制、招聘、流动、培训、考核的全部权限，构建了“县域统筹、分级管理、校为主体”的教师治理新体系，提升了县域教师队伍建设的统筹能力与治理效率，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3. 县域教师队伍生态双重变迁的内在作用机制

乡村学校撤并中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挤压”与“重塑”双重变迁，并非偶然的政策结果，而是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生态系统层面动态交互、层层传导的结果。依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其内在作用机制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宏观政策层的“制度摩擦”传导至中观结构层，引发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宏观层面以效率为导向的撤并政策(如师生比编制核定)，在中观执行层面转化为“县城学校虹吸优质师资、乡村学校沉淀弱势生源”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失衡并非静态，而是通过“资源剥夺循环”不断强化：乡村学校因优质师资流失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进而生源进一步流失，最终迫使更多村小被撤并，从而加剧了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对立。

其次，中观结构层的“竞争挤压”下沉至微观个体层，导致教师发展的“生态位窄化”。中观层面教师共同体的消解与科层化管理的加剧，直接改变了微观个体的生存环境。原本在村小拥有完整“教学自主权”的教师，在中心校庞大的科层体系中，其“生态位”被迫收缩为单一的“教学执行者”。这种“结构-个体”的层间挤压，导致教师的职业认同从“乡村教育的守护者”异化为“教育流水线的操作工”，进而引发了微观层面的职业倦怠与离职倾向。

最后，微观个体的“能动反馈”反作用于宏观治理，倒逼制度的“适应性重塑”[6]。尽管存在挤压，但教师个体并非完全被动。部分教师通过主动适应新环境(如学习信息化技术)、参与非正式组织(如自发

教研小组),形成了微观层面的“抗逆力”。这种来自基层的能动性反馈,迫使宏观治理层面不得不调整政策(如建立“编制周转池”、推行“县管校聘”),从而实现了从“物理集中”向“有机整合”的系统重塑。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重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才振兴,而乡村教师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支撑。必须清醒认识到,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挑战与潜在风险,如,在推进“编制周转池”改革时,需警惕“存量博弈”的阻力;在构建“双向流动”机制时,需防范“逆向选择”风险;在实施“精准赋能”时,需避免“技术治理”的陷阱。基于上面存在的风险,本文从以下五个维度构建系统的优化路径。

第一,回归育人本质,规范乡村学校撤并的制度边界。坚守“教育优先、学生为本、教师为核心”的根本原则,规范乡村学校撤并的程序与边界。一是建立撤并方案的多元论证机制,撤并方案必须充分征求教师、家长、村民、乡村社区的意见,组织教育、人社、编制等部门开展科学论证,严禁地方政府为降低办学成本强行撤并学校;二是建立撤并政策的配套保障机制,坚持“先安置、后撤并”的原则,针对分流教师制定专项的安置、培训、发展配套政策,杜绝“一撤了之”的粗放式执行;三是建立撤并政策的评估与纠错机制,对已实施的撤并政策开展跟踪评估,对严重影响教师发展、学生就学的撤并行为及时纠偏,切实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第二,深化制度改革,完善县域教师统筹治理体系。针对撤并后暴露的制度性矛盾,以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为核心,完善县域教师治理体系,破解结构性矛盾。一是建立县域内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推行“编制周转池”“岗编适度分离”制度,将编制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级教育部门,实现编制“随学生流动、随需求调整”的县域统筹,彻底破解“县城缺编、乡村超编”的难题;二是构建双向均衡的教师流动机制,完善县城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的激励政策,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待遇保障等方面予以倾斜,推动教师从“单向流动”向“双向均衡流动”转型;三是完善县域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以育人质量为核心、兼顾乡村服务的教师评价体系,弱化分数导向的竞争性评价,强化过程性、发展性评价,营造互助共生的教师发展氛围。

第三,强化精准赋能,构建教师全链条发展支持体系。针对分流教师的发展困境,构建全链条、精准化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缓解个体生态的挤压。一是建立分流教师专项帮扶机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学科的分流教师,制定个性化的培训与带教方案,帮助其快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提升专业能力;二是完善乡村教师职称倾斜政策,单独核定乡村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指标,降低评审门槛,将乡村任教年限、控辍保学、乡村服务等纳入评审核心指标,切实拓宽乡村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三是健全乡村教师激励保障体系,扩大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覆盖范围,将乡镇中心校、分流教师全部纳入补助范围,为乡村教师提供通勤补贴、周转宿舍、子女入学等配套保障,降低乡村教师的生活成本,提升乡村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第四,培育共生生态,搭建县域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针对撤并后教师专业共同体消解的问题,以县域为单元,构建多元共生、资源共享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一是构建“县域-中心校-教学点”三级教研体系,推行城乡学校结对、名校带弱校、中心校带教学点的教研模式,实现县域内教研资源、培训资源、师资资源的全域共享;二是完善乡村学校小学科教师保障机制,推行“走教制”“巡回教学”“线上同步教学”等模式,解决乡村学校小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推动乡村学校学科结构的均衡发展;三是培育乡村教师的乡土专业共同体,推动教师深度嵌入乡村社区,将乡村文化、乡土资源融入教育教学,重塑乡村教师的乡土性与公共性,传承乡村教育的文化根脉。

第五,立足地域特色,实施差异化的生态优化策略。四川省地域差异显著,平原、丘陵、山区、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发展基础差异巨大,必须立足地域特色,实施差异化的教师队伍生态优化策略。针对平

原型县域，重点推进城乡教师队伍一体化发展，深化编制与流动制度改革，破解编制结构性矛盾，打造城乡教育共同体；针对丘陵、山区县域，重点完善乡村教师激励保障体系，大幅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完善交通、住宿等配套保障，留住优秀乡村教师；针对民族地区县域，重点加强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符合民族地区教育规律的教师招聘、培养、评价政策，尊重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教育需求，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教师队伍。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教育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四川省 4 类典型县域的田野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乡村学校撤并进程中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双重变迁。研究发现，乡村学校撤并对县域教师队伍生态的影响是双向的、辩证的：一方面，撤并政策对教师微观个体生态、中观群体结构生态、宏观治理生态造成了系统性挤压，引发了教师职业负荷过载、发展空间边缘化、队伍结构失衡、治理制度失灵等一系列困境；另一方面，撤并政策也推动了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升级、队伍结构整体优化、县域教师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实现了教师生态的正向重塑。这种双重变迁，本质上是效率导向与育人导向的逻辑张力、空间重构与身份转换的互动耦合、治理权与自主权的失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突破等多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

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教育账、民生账；不能只关注办学规模与硬件条件，更要关注教师这一乡村教育的核心主体。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今天，乡村教育布局调整必须回归教育本质，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根本，构建良性共生、动态平衡的县域教育生态，让乡村教师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协同课题《乡村振兴视域四川乡村校撤并政策效应审视与优化路径研究》(课题编号：SCJG25A004-3)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范先佐.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原因、动力及方式选择[J]. 教育与经济, 2006(1): 26-29.
- [2] 邬志辉, 史宁中.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十年走势与政策议题[J]. 教育研究, 2011, 32(7): 22-30.
- [3] 朱秀红, 刘善槐, 王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理路、执行陷阱与改革逻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40(6): 16-30.
- [4] 金志峰, 庞丽娟, 杨小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现实问题与路径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5-12.
- [5] 叶澜. 教师教育的生态式反思与重建——试评约翰·I. 古德莱得《为称作学校的地方培养教师》[J]. 基础教育, 2023, 20(1): 111-112.
- [6] 白杨, 代显华, 汤永洁. 乡村教育政策执行者能动参与乡村教育振兴的协同机制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23, 39(1): 20-25+58.